

傳播新聞教育如何影響閱聽人解讀 ---以愛滋病新聞為例

How College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Impacts on Students' Interpretation--- A Reception Analysis of AIDS News

陳婷玉* (Chen, Ting-Yu)

(Received December 7, 2011; Accepted October 11, 2012)

摘要

本研究採文化研究中的接收分析取徑，探討熟悉媒體敘事慣例與運作邏輯的新聞相關科系大學生，如何解讀愛滋病/愛滋死亡新聞。研究發現，閱聽人「利他」的自我形塑藉著對愛滋文本的優勢解讀而得以彰顯與維繫，一旦新聞事件涉及「公共安全」、「公共衛生」、「眾人福祉」，愛滋病患便成為「他者」，以便服務自我認同的優越性與正當性。另外，若閱聽人將新聞報導解讀為媒體善盡「告知」的責任，企圖「警惕」大眾、並「阻嚇」可能的犯行者，閱聽人便容易與媒體站在同一陣線，而做出優勢解讀。本研究發現一旦與閱聽人認同建構中重要的價值（如利他主義）相抵觸，對立解讀（反抗文本意涵）便難以開展，而新聞教育亦導致閱聽人易於採納媒介文本的優勢解讀。

關鍵詞：接收分析、愛滋病、新聞教育

Abstract

Applying the approach of reception analysis, the study explored how college students who have majored in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 interpret AIDS and AIDS death news. It was found, by “othering” people with AIDS and making dominant decoding of AIDS news in the newspaper, students construct and maintain their self-identity of the merit of altruism. Furthermore, influenced by the training of journalism, the students tend not to criticize the media when the media was conceived of surveying the environment to inform people of danger. The college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seems to prevent students to make the resistant decoding toward news text.

Keywords: Reception Analysis, AIDS, College Education of Journalism

*南華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nhua University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被閱聽人實證研究視為「神主牌」的製碼/解碼模式，由英國文化學者 Stuart Hall 提出，對文本與讀者關係的研究影響甚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英國學者 Morley 的「全國觀眾」閱聽人解讀研究，其研究發現支持 Hall 的命題，指出讀者依著他們的社會文化背景而有不同的解讀位置，而隸屬於不同的詮釋社群，這是屬於文化研究領域的閱聽人研究 (Alasuutari, 1999; Wood, 2006)。

受限於進行研究有限的資源與時間，多數閱聽人研究著眼於呈現特殊詮釋社群的解讀型態，亦即 Barker 所言「有關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情境下，對特定文本解讀的巧妙描述。」。此類型研究不勝枚舉，若以文本類型來劃分，舉凡報紙新聞、電視新聞、電視觀眾討論節目 (Livingstone, 1994; Wood, 2006)、電視運動節目、電視紀實娛樂頻道 (徐孟延、邱琬淇, 2006)、家庭情境喜劇、戲劇節目 (李佩英, 2006; 廖依婷, 2004; Moran, 2003)、電影 (Barker, 2006)、教育錄影帶、電視廣告 (謝炫達, 2001)、電視卡通 (林妤芳, 2005)、暢銷書、羅曼史小說等都在分析之列。

本研究選取大眾傳播及媒體主修的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企圖了解這些對媒體生態與運作模式已相當熟悉的閱聽人，是否因其擁有的媒體素養與練達而傾向批判地解讀媒體文本？是否較能思辨文本中的優勢意識形態與媒體再現？而文本的選擇則以一直以來遭受汙名化的愛滋病新聞為解讀的客體，尤其著眼於愛滋病死亡的報導。愛滋病死亡並非台灣地區民眾的頭號殺手，事實上，每年死於愛滋病的人數和十大死因所造成的死亡人數相去甚遠。然而愛滋病與愛滋死亡，在台灣乃至全世界所引起的恐慌，卻遠遠地超過了歷史上所有曾出現的疾病。它被賦予各種社會及文化意涵，並引發恐慌疏離輕視恥辱同情憐憫等各種情緒 (林文琪, 1996; 陳婷玉, 2009; Bertman, 1991; Devine, Plant & Harrison, 1999)。

除了愛滋病本身所具備的惡疾特質使其罹病者背負污名與歧視外，愛滋病的新聞價值使得它在大眾媒體上獲得相對大量的報導 (Doka, 1997; Lupton, 1994)。一般沒有和愛滋病或愛滋病患接觸的民眾，對這個疾病的感知似乎都是透過媒體，由媒體來刻劃人們腦海中的愛滋病圖像 (尤昱婷, 2001; Albert, 1986; Boshier, 1992; Kitzinger, 1998)。在愛滋病的各種社會意涵及文化建構中，最強而有力、也最具持續性的，便是「死亡」這個建構 (陳婷玉, 2009; 陳婷玉、徐美苓, 2001; Whalen, Henker, Burgess & O'Neil, 1995)，愛滋病的再現使其和死亡成了同義字。愛滋病及愛滋死亡的特定意象被充分地建構於不同的言說場域中；科學、傳記、文學，當然也在流行的論域中；媒體及街頭巷議 (Small, 1993)。筆者在過去的研究中發現，媒體有關愛滋死亡的描繪與我們文化中所恐懼的死亡形式---歹死---有緊密的構連，如「死無葬身之地」、「死得很難看」、「無法控制的死亡」、「孤獨的

死亡」等（陳婷玉，2009；陳婷玉、徐美苓，2001）。本研究的目的則在檢視媒體所呈現之愛滋病死亡的主題與其隱含的文化意涵及社會意義，是否為閱聽人所分享，關注閱聽人解讀的實證層次。誠如 Hall 所言，分析媒介的意識型態不能只是分析生產與文本；究其實，合理的分析必須包含一個讀者理論與消費的分析（引自馮建三譯，1995）。本研究擬以 Morley 與 Brunsdon（1999）所倡行的接收分析取徑，來窺知閱聽人對媒體的愛滋病死亡新聞，如何進行解讀及賦予意義，以觀察文本訊息與閱聽人經驗間的互動脈絡。

貳、文獻回顧

一、相關理論/概念與文獻

意義產製過程的兩種壓力類型，即產製意義的兩大來源，首先是文本/訊息的內在結構與機制，這些結構與機制可能導引某些解讀方式而阻礙其他解讀方式，第二個來源是接受者/閱聽人歧異的文化背景，可能造成不同的解讀。前者屬於符號學/語言學的範疇，後者則為社會學的研究領域（Morley, 1992/馮建三譯，1995）。以 Hall（1980）的語彙來說，即為製碼端的文本意義及解碼端的閱聽人意義，而在製碼端與解碼端究竟何者較佔優勢的論戰上，學者們的爭辯似乎至今未曾稍減，以下便就文本再現的力量與閱聽人主動性相關文獻進行檢閱。

（一）文本霸權主義

現今多數社會學者對「真實」已有共識，認為人類真實是社會建構的（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 Alasuutari, 1999; Denzin, 1998; Hall, 1980; Hall, 1982），意義是社會的產物，透過語言而轉移，於是同樣一個事件可能以不同方式被呈現，意義不是由事實本身的結構來決定，而是受制於象徵的社會實踐，語言表徵的過程就是一種社會實踐。台灣媒介批判研究先趨學者張錦華（1994）指出，媒體作為現代社會中一個強勢的知識產製體系，操弄著各種符號，這些符號被刻意地「自然化」，而「自然化」的執行顯示符碼使用的習慣性與普遍性。符號隱含義中的迷思就在這個「自然化」的過程被簡化為一種純粹的意旨作用，人們可能清楚地瞭解其意涵，卻無法察覺其迷思特性（引自吳志怡，2002）。迷思原本是某個社會階級的產物，而這個階級已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中取得主宰的地位，因此迷思所傳佈的意義，必然和這樣的歷史情境有關。而社會先存的意識形態，自然也會再現在媒體上（引自倪炎元，2003）。批判語言學及 Barthes 的符號學都關心權力運作、階層形塑、排除與壓制等現象（蘇峰山，2005），而其研究幾乎都將重點放在文本中的符號，對閱聽人極少論及。以符號學、論述分析等方法進行的媒體再現研究，在傳播研究中數量龐大，各類議題及社會群體的媒體再現紛紛受到關注，本研究因涉及閱聽人對愛滋

病及死亡的理解，以下就兩者的媒體再現相關研究做一精簡的回顧。

(二) 愛滋病的再現

疾病從來就不只是一個生物現象，它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的，它是一個社會、政治、道德事件 (Crossley, 1997; Crystal & Jackson, 1992; Doka, 1997; Miller & Beharrell, 1998)，傳遞著負面的道德定義，健康的追求成為一種道德的追求，因為一旦罹病，便陷入不道德的泥淖之中，不得翻身 (Sontag, 1990)，即使在西方生物醫學模式打破了傳統文化建構 (道德說) 的現今社會，疾病的文化意涵及生物意涵交互作用，社會、經濟、政治壓力仍有強大力量來定義疾病，使其與邊緣社群掛勾 (Hays, 1998)。

愛滋病的媒體再現研究一直受到社會與文化學者的關注，Boshier (1992) 指出美國報紙媒體愛滋病建構的演進，由最初的男同性戀者的黑死病論述，緊接著是受污染的他者論述，繼之無辜受害者論述 (如經輸血而得愛滋)，其後是異性戀者的危機論述。九十年代之後，媒體則轉將愛滋病與發展中國家構連。而在愛滋病與性別的議題上，研究發現媒體除了將愛滋病與男同性戀者構連 (Pollock III, Lilie & Vitte, 1993)，亦將女性性工作者描繪成愛滋的傳播者 (King, 1990)，其他女性則完全被忽略或被建構成男性與未出生嬰孩之間的帶原者，並不斷以母親及照顧者的角色再現 (Watkins, 1998)。Kline (2006) 在回顧有關 HIV/AIDS 的媒體內容研究時亦指出，在過去十年中，探討 HIV/AIDS 論述的刻板印象化和污名化的研究十分豐富。

過去西方學者批評媒體採取一種科學宰制的觀點和醫學的框架來報導 AIDS (Ziehl, 2002)，近來研究則發現，媒體開始將愛滋病議題置入不同的種族、文化、認同、政治經濟情境中探討；Clarke, McClellan, and Hoffman-Goetz (2006) 檢視以非裔美人為目標讀者的流行雜誌中，HIV/AIDS 如何被呈現，發現媒體對這個族群矛盾的形象建構：既是面對疾病時無力的受害者，也是社會支持力量很強的非裔社群網絡之一員 (非裔美人常以「兄弟」(brothers)、「姊妹」(sisters) 相稱)，有能力預防及對抗 AIDS。Clarke, Frideman, and Hoffman-Goetz (2005) 另分析 14 份以加拿大原住民為發行對象的英文報紙中，原住民愛滋病患如何被形塑，發現相較於主流媒體採用的醫學框架再現，這類報紙在討論愛滋病患、對愛滋的恐懼及社區的反應時，常常指涉原住民文化及原住民的政經位置。綜上所述，西方有關媒體愛滋病再現的研究，已非如過去將愛滋病單獨地、斷章取義地拉離它發生的情境來分析文本，而是將其重新放回它所存在的社會、文化、歷史脈絡來審視。

台灣的愛滋病再現研究由林文琪 (1996) 所進行的媒體愛滋病語藝視野研究展開序幕，她歸納出報紙新聞的兩個幻想類型：「愛滋病焦慮恐慌症候群」、「愛滋病的罪與罰」，以及社群成員所共享的語藝

視野：「世紀黑死病」，並指出愛滋病語藝視野重演了歷史上對於惡疾的泛道德詮釋，並複製了恐懼、焦慮與沉默。尤昱婷（2001）關切愛滋人權，由「概念」與「內容」兩個不同的層次來進行愛滋人權報導的論述分析，分別由隱私權、醫療權、工作權、遷徙權、擁有婚姻與家庭權來看感染者與病患之形象與社會關係建構，並從權力與權利兩面向及論述運作，來探討媒體所建構的愛滋人權。徐美苓、吳翠松、林文琪（2003）以愛滋病主題為例，探討主流媒體如何藉由對他/她者的建構，試圖釐清對社會情慾多樣性的規範，並將1984到1999年底的愛滋新聞分成六個時期（外來疾病、男同性戀者、入侵家庭、東亞/東南亞進口的疾病、識別轉變、爭取人權期），整理出愛滋論述中他/她者邊緣化的型態與機制。

（三）死亡的再現

曾是癌症的倖存者，已故的文化學者 Sontag（1990）提醒我們，對疾病的隱喻反應及框架、認知疾病的方式，深深地影響我們如何對待罹患疾病的人。死亡學者 Bradbury（1999）亦以同樣的概念闡述死亡；有關死亡的論域或故事的再製，常利用特殊的語言格式和隱喻來表達，這種企圖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我們對生命及死亡的社會建構之基石。死亡的論述反應我們的意識型態，也影響我們如何對待死者及其親人。既然死亡亦是文化建構，一位文化學者在他的田野研究中常聽到死亡事件被描述成好死/歹死、自然死亡/不自然死亡也就不足為奇。固然還有很多方式來思考死亡，但這種死亡二分法（好/壞，自然/不自然）的再現方式，卻世代代存留於一般人的意識中。雖然不同觀點（醫學、人類學、自然主義等）所建構的好死意念並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衝突，但是我們對一個死亡事件的好死/歹死認知，卻仍有些可指認的因素，如好死是平靜而有尊嚴地死去、沒有拖延的病痛、身體沒有損壞變形、朋友親人隨侍在側、活到很大歲數（壽終正寢）、獲得應有的醫療照護等。而歹死除了不具上述特徵，還帶有失控感，即不能控制及不能預測的死亡（Bradbury, 1999; Small, 1993）。

陳婷玉和徐美苓（2001）與陳婷玉（2009）將愛滋死亡的媒體建構放入台灣人特有的死亡與殯葬文化脈絡中進行分析，發現媒體的愛滋死亡意象呈現出台灣俗民文化中的「歹死」、「不自然死亡」、「不正常死亡」典型。一般而言，歹死帶有高度的社會顯著性、令人不安且印象深刻。社群似乎有一個好死的原型，然而目光卻放在歹死，利用區辨這兩者的極端來言明好死。而歹死/好死的再現不是由個人表達，而是文化中所制約、產製出來的看待死亡的方式，用以描繪、維持社會秩序。對一個社會而言，歹死十分有用，通常會降臨到那些行為不良或外團體的成員身上，歹死（不得好死、不得善終）的威脅是對所有社會成員的警告。

愛滋病的新聞價值使它在大眾媒體上獲得相當多報導，滿足了人

們好色及偷窺的慾望 (Lupton, 1994)。娛樂節目及新聞媒體所呈現的愛滋文化意涵被大眾分享著，尤其是和愛滋病與愛滋病患沒有直接接觸的人，對這個疾病的感知都是透過媒體，新聞報導對一般人有關愛滋病的印象形成，很有影響力；包括對愛滋病污名化、矮化、貼標籤，產製負面評價，及創造不被贊同的社群 (Albert, 1986)。縱使若干媒介理論家強調文本的多義性，主張媒體的效果很少，因為每個人在看到或聽到媒介文本時會帶入自己的經驗與解釋，然而研究卻發現人們在理解愛滋病報導的雷同，媒介確實在告知、塑造、與維持對愛滋病的態度上，發揮了相當程度的作用 (Boshier, 1992; Kitzinger, 1998)，更重要的，媒體對愛滋病的框架與定義會塑造人們的集體行為和社會政策，因而影響愛滋病感染者及患者對自己的價值評斷與對未來的希望與健康的評斷 (Kitzinger, 1998; Volinn, 1989)。

二、主動閱聽人典範

雖然 Hall 的製碼/解碼模式及 Morley 與其他學者對閱聽人接收所進行的諸多研究使我們反思閱聽人的意義，不少文化研究學者仍主張訊息的產製與接收並不對等，認為文本的先決性已使閱聽人受制於文本的結構，所以閱聽人的詮釋仍是受限的 (Curran, 1995; Hall, 1980; Neuendorf, 2001)。學者亦批評英國的接收分析理論刻意凸顯媒體的有限效果，並誇大了閱聽人產生顛覆性對立解讀的潛力 (Cobley, 1994)。

對於這樣的主張，閱聽人研究學者提出反駁：文本雖有論述力量，但在其產生任何「效果」之前，都必須被閱聽人先行解碼 (Livingstone, 1998; Morley & Brunson, 1999; Ruddock, 2001; Schroder, 1994)。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文本視為論述建構，卻不能假設閱聽人都會去佔據該詮釋位置，意義應由兩方理解。也許我們可借用 Kavoori (1999) 對國際新聞文本與閱聽人接收的研究發現作一說明，即「論述的文本，反思的閱聽人」，任何文本中都隱含著特定的意識型態，而在觀眾層次，則出現了一種批判性媒體消費的全球文化。

本章節將針對閱聽人的主體性、人們對愛滋病的理解與主觀詮釋進行文獻的探討，瞭解人們如何看待 AIDS。

(一) 閱聽人的主體性 (主體意識)

相對於文本霸權觀，從事閱聽人研究的學者則主張，個體具有主體性，也就是一個人如何以自己為核心，藉由社會文化與自然環境而成為一個主體，並形成主體意識。這種自我意識係經由指涉世界而獲得 (引自盧嵐蘭, 2008) 此種指涉包含一種注意及其視域，同時兼具概念能力及經驗能力，以及對自我定位與置身的想像能力。從傳統的結構主義觀點來看，主體是被結構決定的，每一個人都不免被召喚至特定的主體位置。其主要特徵是個體在某個範疇中的定位方式會限制或促成對某個議題的觀點。Anton 與 Petersin 認為採用主體位置的概

念，在某種程度上，便是意指多種觀點的存在（引自盧嵐蘭，2005）。本研究將焦點置於自我為社會互動產物，並具有反身性。為應付現代社會的不確定性，主體會反省自我、監視自我，而自我處於主體與環境的互動過程內，將採用一些文化資源來建構自我，或者說來建構認同。同時這種反身性及互動性的自我管理過程，不能排除被其他支配與控制力量予以殖民的可能性（當然自我亦有抗拒的可能）。而在眾多力量中，盧嵐蘭（2007）指出媒體對自我與認同的影響不容忽視，因為個體會因媒體使用而改變認知、興趣、與關懷等相關範疇，也就是說媒體及其文本具有定位閱聽人主體的效果。因此本研究企圖檢視閱聽人對愛滋病/愛滋死亡的解讀，並探究文本解讀與其認同建構之間複雜的依存關係。

（二）愛滋病的解讀與社會建構

愛滋病是一個普遍性的惡疾，其影響遍及世界每一個角落，而愛滋病所產生的歧視、偏見、污名化的問題也受到各個不同文化群體的關切，因此有關人們如何理解愛滋的研究也在世界各地展開。早期研究指出人們對 AIDS 的憂慮、不安、失控感及一般常識中對 AIDS 的誤解和無謂的恐懼（Asera, Bagarukayo, Shuey & Barton, 1997）；而注射毒品與 HIV/AIDS 構連，將城市空間分割，「受感染」區被人們認為是被玷污、骯髒、失序、衰退、邪惡的城市一角（Woolford, 2001）。

本研究在回顧愛滋病媒體再現時，發現西方媒體逐漸將愛滋病置於在地的文化、政經、宗教等情境中討論，無獨有偶地，在探討人們對愛滋病的理解時，許多學者亦指出人們對愛滋病的建構與其置身的宗教、文化、政經體制緊密相連。Smith（2004）發現西非奈及利亞偏遠地區青少年對 HIV/AIDS 多以其所信仰的基督教福音教派主流論述來詮釋；Eves（2003）則以質性民族誌方法研究位於太平洋西南的島嶼國家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農村社區如何看待 AIDS，發現人們所信仰的基督教傳統天啟論是他們最主要的詮釋框架；而一個中歐與東歐（愛沙尼亞、喬治亞、匈牙利、波蘭、蘇聯）的跨國研究亦指出，人們對 AIDS 的起源和傳佈的理解受到文化的影響，Goodwin 等人（2003）將這些國家人們對 AIDS 的理解，透過共產主義的歷史傳統來詮釋，並由這個區域當今面對的經濟、社會挑戰來看其對 AIDS 解讀的影響；Posel, Kahn, 與 Walker（2007）等人在南非農村做焦點團體訪談，以瞭解居民對年輕人及中年人死於 AIDS 的看法及對 AIDS 的理解，發現人們將死亡歸因於社會文化因素，而非 AIDS，這個研究的重點在於人們提供「歹死」（bad death）一個文化的解釋，疾病被理解為一種文化的損傷。由此可知，人們對愛滋病的解讀不僅可能受到媒體文本的影響，更與其所擁有的特殊資源（包括物質的、符號的、文化的、宗教的、社會的...）與特殊經驗息息相關。

而在台灣，有關人們對愛滋病的理解研究，大致集中在人們對愛

滋病的認知、態度、傳播行為、新聞呈現與訊息設計如何影響其對病患的態度、支持病患權益的程度等（李文忠，1993；黃如伶，1995；徐美苓，2001；徐美苓、陳瑞芸、張皓傑、賴奕帆、林佳韻，2006）。這些研究多屬量化的行政研究，而關注閱聽人如何解讀愛滋文本的詮釋性的、質性的研究則付之闕如。本研究採質化研究方法，檢視閱聽人對報紙所建構愛滋病死亡的理解如何與文本以及閱聽人所在的文化脈絡互動，以及閱聽人在此過程中如何展現其主體性。

參、研究方法

一、文本的選取

閱聽人接收實證研究的類型，學者們大多引用 Corner 的分類，即所謂公眾知識研究與流行文化研究，前者主要是事實性的媒體文本，告知與產製知識的方式，後者則是虛構或娛樂文本，提供想像的愉悅（Gray, 1999; Livingstone, 1998; Moores, 1993; 徐詠絮與唐維敏譯，1997）。當代的閱聽人研究，著重在各式各樣的戲劇等非事實性文本，台灣近年來的閱聽人解讀研究重點，亦放在戲劇等娛樂性質的文本（如李佩英，2006；林好芳，2005；廖依婷，2004；謝炫達，2001），新聞及事實性文本的解讀研究較被輕忽，可能是因為新聞一般被認為是與事實陳述有關的文本，看來「純潔透明」，新聞學中論斷「純淨新聞」的分類，似乎造成一種新聞是不摻雜主觀論斷與價值判斷的錯覺，加上新聞與時事節目的閱讀，總是被賦予合法性，視為正當。人們總是說他們看新聞和時事，好像這是一個公民的責任和義務（Alasuutari, 1999; Gray, 1999; Morley, 1999），而受到肯定及社會讚許的文本符碼可能更容易被自然化而視為理所當然。即使如此，閱聽人卻不必然依著文本的企圖來理解，過去若干研究發現也呈現不一致的結果（Livingstone, 1998）。再者，若真如 Kavoori（1999）所言，新聞的閱聽人由於對新聞敘事慣例熟悉，並對媒體報導的意識型態有所警覺，因而發展出所謂媒體素養及練達，而產生批判性的媒體解讀也未可知。

本研究檢視閱聽人對新聞中的愛滋死亡報導如何理解，但在研究進行之前應對文本先行了解。分析訊息的目的，在於釐清訊息的再現類型與結構，並找出訊息所依附的概念與類目，究竟隱藏了哪些意識型態。本研究的這個部分乃是根據研究者過去對愛滋病死亡報導的新聞論述分析所獲得的十一個建構主題：在公共場域中的死亡、骯髒不潔的死亡；罪有應得的死亡、無可避免的死亡、難堪又難看的死亡、孤寂的死亡、無助痛苦的死亡、未臻成熟的死亡、快速的社會集體死亡、危機四伏的死亡、值得紀念的死亡（參見陳婷玉，2009）選擇若干報導中呈現這些死亡主題的新聞剪報，作為給予閱聽人解讀之文本，一報導中若有多個死亡建構主題之呈現亦無妨。焦點團體訪談參與者閱讀的新聞剪報共十則，其新聞標題與副標見附錄一。在檢擇新聞之時，盡量選擇較為平鋪直述、呈現事實較不帶有

情緒、批判、譴責的字眼及語氣的報導。

二、資料收集方法

一般而言，質化研究方法能取得閱聽人的主觀理解（詮釋）資料，忠實描述其意義與經驗。過去焦點團體法只是大規模量化研究的輔助，現今焦點團體是一個獨立的方法，而由於此法能針對焦點問題，提供大量語言互動的機會，學者們更將其視為一種允許人們討論議題的場域，如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概念，而團體所討論的內容，亦被視為一種論域（Alasuutari, 1999; Lunt & Livingstone, 1996; Nightingale, 1996），而不僅是一種個人解碼或認知結構。如本研究中的愛滋死亡報導是為媒介論述，而參與焦點訪談者對報導文本的理解與詮釋之文本則是閱聽人論述。

本研究以傳播新聞相關科系的大學二、三、四年級學生及二技在職專班二年級（相當於大學四年級）學生共四個團體進行訪談，每一團體成員數目約在七到九名之間，本研究在 2003 年 5-6 月間進行。

焦點團體訪談在一個大小適中的討論室中進行，每位參與者皆可看到主持人及其他與談者，主持人鼓勵每個人盡量發言，每一場討論約進行兩小時。訪談的進行是先讓與談者花費約二十分鐘將十則新聞剪報閱讀一遍，然後進行討論，討論由研究者親自主持，先提問一般性的問題（如：你們對這些新聞有什麼感覺？你們對這些新聞描述中的愛滋病/愛滋死亡有何看法？），之後再針對每一則新聞個別討論。所有討論皆全程錄音，以利逐字稿的製作。

三、受訪者的選取

焦點團體訪談與談者的互動相當程度地影響討論的質與量，若是彼此不熟悉的與談者，可能造成不願透露自己的想法與感情（胡幼慧，1996；Gunter, 2000）。本研究選取同班的大學生，同質性高且彼此熟識，可以很自然地交談並以該族群特有的語言習慣來暢談自己的經驗及解釋。

本研究探討傳播/新聞相關主修閱聽人對愛滋病死亡報導是否有不同的解讀型態？鑑於大一學生所接受的新聞專業知能訓練尚不足，本研究受邀的與談者為新聞相關科系大學二年級以上學生，除了新聞專業實作課程，也必須修習大眾傳播概論、傳播理論、社會學、傳播研究方法、新聞學等課程，部分與談者亦修過閱聽人研究、媒介生態研究、文化研究、媒介批判等選修課程。本研究檢視這群具有特殊符號資源的閱聽人面對愛滋死亡新聞時，如何解讀、評估其內容？

肆、研究發現

筆者曾針對報紙的愛滋死亡報導進行論述分析，找出若干媒體描述愛滋死亡的方式，發現媒體將世俗眼光中的「歹死」或「不正常的死亡」與愛滋病構連。

本研究觀察閱聽人是否察覺到媒體建構愛滋死亡的方式及文本中所隱含的意識型態。

大部分的與談者對愛滋病/愛滋死亡新聞報導的理解與文本意涵似乎並無太大的出入，畢竟新聞被認為是「事實性」的文本。因此學者 Deacon, Fenton, and Bryman 等人 (1999) 便曾指出，閱聽人對新聞文本的解讀所可能產生的歧異，並非如電視、戲劇、小說等虛構的文本，也就是說，閱聽人所產生的並非「詮釋」(interpretive) 上的不同，而是「評價 (evaluative)」上的不同，也就是對文本內容是非、對錯的評估。

由四個焦點團體訪談所形成的閱聽人論域，即愛滋死亡報導解讀型態，基本上和文本分析時所產生的主題相呼應，但新聞文本的主題似較多元 (十一個主題)，而分析閱聽人論域，則發現集中在以下幾個主題：愛滋死亡是死無葬身之地、愛滋死亡是骯髒污穢的死亡、得愛滋病是犯罪/愛滋死亡是罪有應得、自尋死路、得愛滋必死無疑、愛滋病與 SARS 的互文性、媒體教育與愛滋解讀。(以下所引用語料之受訪者，數字代表不同組別，英文字母則代表不同與談者)

一、愛滋病：生時無容身之處，死亦無葬身之地

本研究用來做為團體討論的新聞剪報，多為一九八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的報紙新聞 (見附錄一)，其對愛滋病污名化及他者的建構相對於本研究進行的時間點 (2003 年中，值愛滋病的媒體建構逐漸進入病患權益保障討論的人權期)，無寧是較為嚴重的。徐美苓 (2001) 的量化研究中雖然指出，歷經十多年來的經驗累積，民眾普遍知道愛滋病正確的傳染途徑，然而在本研究的訪談發現，大學生對愛滋病的感染途徑似乎仍有相當程度的誤解，而這些誤解可能使社會對病患的排拒合理化，如受訪者 1B 提到：「可是我覺得安寧病房不收 (愛滋病患)，其實也是為了其他病人好啊...，如果是在安寧病房，然後其實大家都是不能動的，就是不得動彈，已經重病，完全沒有辦法防備說你傳染給我啊!...你既然是得愛滋病，你也應該做好你自己的那個本分，你不應該去感染別人。」。受訪者 4G 則說：「你會不會想到你可能、可能去因為被人家刺啊，嗯，搞不好你哪天打電話，摸那零錢口被刺到而得到愛滋病，這是有可能的。」由此可知，媒體早期愛滋病的報導，對閱聽人的誤導影響十分深遠。

媒體再現人們對愛滋病/愛滋死亡的恐懼與對罹病者的厭惡、孤立與隔離，除了早期將之視為一般流行病，而有大规模消毒感染者住處的荒謬舉動，最常見的是有關愛滋病人被社會嫌惡拒絕的事件，如醫護人員不願照顧病患、房東將患病房客逐出、愛滋中途之家無處設置、罹病孩童失去就學權，甚至病患往生後的屍體遭殯儀館拒收，火化後的骨灰家人也不要。而不論基於道德考量 (如受訪者 1C 說：「可是我覺得當妓女的，一個愛滋病患，她來了我 (指醫院、殯儀館) 也要收喔?」)、公共衛生考量 (如受訪者 1E 辯稱：「我覺得這牽涉到到底那個人死了之後會不會傳染。」) 或一般人普遍的恐懼心理 (如受訪者 1D 表示：「可是我覺得是害怕耶，就像你

知道那麼清楚，不會傳染，你還是會害怕，我覺得那是心理作用，不是說你真的會傳染到。」)，多數受訪者對我們社會中對待愛滋病患的方式，似乎並未表達太多反對意見。

固然有受訪者為愛滋病患的遭遇打抱不平，但多數是基於人道立場，認為死者為大，既然人死了，就應該受到應有的尊重云云，然而這種論調並不表示閱聽人對愛滋病/愛滋死亡改變了態度，而純粹是受到一種廣泛的、尊重死者的民俗傳統影響，而對愛滋死亡的「大赦」。

本研究的受訪者，在理解愛滋病患的處境時，似乎是以維持公共安全的思維來作為指導原則，因而對媒體所報導愛滋病患受歧視、排擠的文本並無法提出批判，因為只要會危害到下一個人，危害大眾健康，閱聽人便傾向對文本產生優勢解讀。如此看來，閱聽人有關不得妨害他人的自由與安全的思維，顯然在其愛滋病新聞的解讀中，發揮極大的作用。

二、愛滋病：髒污的死亡

早期將愛滋病視為如霍亂、虐疾等傳染病的荒謬，在醫療體系中亦可見一斑。有關愛滋病死亡髒污的再現，例如高醫解剖第一位死亡的愛滋病患時的嚴密措施：「將解剖室地面全鋪上藍色不透水及不透氣的塑膠帆布，另依病人身材訂製同質料塑膠帆布，鋪在解剖台上，解剖結束後，遺體及所有器材連同醫護人員穿戴衣物，都包在塑膠帆布並裝進棺木，送往火葬場火化」（民生報，1988年8月5日）。諸如此類的媒體文本對愛滋病死亡是帶有相當程度歧視成分的，這些文本距今已逾二十年，然而本研究的閱聽人在解讀二十年前的這則新聞時，多認為高醫的處置並無不妥，甚至稱許醫院處理的方式十分周全，並以「第一例」來合理化高醫「高度謹慎」的措施，認為即使犧牲死者的尊嚴，然而由於是「第一例」，為了保護活著的人，這樣的作法很合理。受訪者2H說：「我覺得他是要讓還住在這間醫院的人比較放心吧。所以他才會把這些過程詳細地寫出來，甚至犧牲掉死者的尊嚴，然後做這樣的處理，就如果有心人士在這間醫院，又正在這個期間的話，我覺得醫院這樣的處理才會讓我覺得安心。」。

而有關愛滋病患的屍體「應施行火葬」，以及其屍體在「必要時，經病患或死者家屬之同意，得施行病理檢驗」的規定，在2007年的條文修訂中，終於移除，僅規定「...感染者之屍體...地方主管機關...應立即指定醫療機構依防疫需要及家屬意見進行適當處理」。有關愛滋病患屍體必須施行火葬的爭論，早在1990年愛滋防治條例公布施行時已開始，其實愛滋病毒並不會經由空氣、水或土壤等不可控制的方式傳染（蕭白雪，2007），病毒一離開人體亦無法存活（楊惠中，2005）。然而在本研究中，多數受訪者卻似乎受到新聞文本的召喚及法律的制約，而傾向文本的優勢解讀，認為愛滋病既然是傳染病，「理應」火葬以「殺菌」，避免「污染」、「傳染」。筆者並非主張閱聽人同意愛滋病患屍體行火葬，便是傾向優勢解讀，固然目前在台灣，火葬已十分盛行，可能多數基於經濟及環境空間的考量，台灣喪葬文

化中整體對生死與殯葬選擇態度亦已改變，然而許多受訪者同意愛滋病患屍體火葬，似乎並非基於上述理由。如「它畢竟是傳染病，火化是理所當然的，盡量不要讓活人去碰到吧！」(受訪者 3A)。「我覺得你現在土葬喔，屍體(愛滋病)會隨著土壤污染。」(受訪者 3D)。「我是突然想說土葬，你看我們有時候去掃墓的時候，他們都會長一些樹，你會覺得那是不是病毒？」(受訪者 1E)「對啊!愛滋病、SARS 都一樣，就迅速火化，他應該馬上送火葬場火化，馬上的哦!對，這處理過程較乾淨。」(受訪者 3B)

相對於受訪者對愛滋死亡病患屍體火葬的贊同，部分大學生亦提出自身對火葬的看法，雖然多數學生能接受火葬，甚至偏好火葬，其理由與目前台灣的都市生活型態與土地空間利用現狀相呼應，不外乎是為了其便利性與經濟考量。然而不少受訪者表示，如果條件許可，仍然會選擇土葬，並提及台灣人的文化中，死了應該要留全屍，以及入土為安、風水、庇蔭後代等概念。許多大學生更表示，老一輩的人不會贊成火葬，「有人覺得那(火葬)又是一次受苦，老一輩的人不喜歡」(受訪者 2H)，而曾目睹火葬的受訪者亦表示其對心理的衝擊很大：「看自己認識的人推進去，出來那種感覺真的非常震撼，因為我第一次看到過世的人火化是同學的妹妹，然後那時候我也是第一次到殯儀館，然後到火葬場，他在棺材裡面的時候，我其實還會覺得他還在，然後推進去，出來那一剎那你就會覺得怎麼人已經變成白骨了...我沒有想過我自己要火化還是要土葬，可是我覺得就是自己的親人還是朋友，如果你要去看他火化，真的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氣。」(受訪者 2G)

受訪者在論及愛滋病患的屍體時，幾乎異口同聲地贊成施行火葬，顯現出被屍體污染的恐懼，其中亦不乏無知或非理性的恐懼，然而一旦涉及自身，雖基於便利性與經濟考量而接受火葬，卻似乎是一種迫於現實與無奈的選擇，因而仍有不少受訪者聯想起留全屍、入土為安、風水等台灣傳統喪葬文化建構，並透露出對火葬的不安、恐懼與不確定性。

三、愛滋病：罪有應得

林文琪(1996)歸納早期台灣媒體建構愛滋病的幻想主題之一便是「愛滋病患的罪與罰」，罹患愛滋病和犯罪緊密地扣連在一起，陳婷玉、徐美苓(2001)亦指出，媒體將愛滋病做泛道德的詮釋，建構其「罪有應得」「死不足惜」的死亡意象。在本研究的四組焦點團體、超過十小時有關媒體報導愛滋/愛滋死亡的討論中，不論哪一個討論團體，出現最多的就是和犯罪、不道德有關的字眼和概念，這些與談者雖然指陳媒體總是將愛滋病和不正常性行為連在一起，但在討論中卻亦是不自覺地提到愛滋病患的罪有應得和自尋死路，尤有甚者，許多人認為愛滋病患會故意害人，認為他們因為受到歧視，便產生報復的心態。這應該和媒體報導駭人聽聞的愛滋病患行徑，以及相關法令中對愛滋病患捐血的處罰脫不了關係。受訪者 4A說：「我覺得應該把他們(明知自己有愛滋病而捐血之人)關起來，...這比

放毒氣還殘忍，而既然你用不人道的的方法對待其他人，就是你違反公共安全的話，那影響是比殺人什麼還深遠的...。」由上述訪談資料看出，受訪者將愛滋病捐血和殺人做類比，足見其對愛滋病患與犯罪的構連。

早期愛滋防治條例規定，凡是「高危險群」必須隨時受檢，若不從則處以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聯合報，1987年7月25日），明知自己為感染者，而將愛滋傳染給他人、傳染未遂、以及愛滋帶原者捐血都要處七年以下徒刑。而在2007年的修法中，雖然較之過去，在愛滋患者的基本人權、相關權益的保障以及在執法時對感染者人格與自主的尊重多有著墨，但所謂蓄意將愛滋傳染於人、未遂及捐血者的刑罰，卻提高為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行政院衛生署，2009）。由此看來愛滋病患仍無法除罪，並且仍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因患病而可能必須負刑責的案例。同樣是捐血，何以B型肝炎或其他病毒帶原者不必受罰？法令的制定可能引發人們對愛滋病/病患的想像，使得人們認為愛滋病患會故意捐血，會因想報復而害人，所以理應有法律來規範。受訪者4E便說：「不能說因為今天我們想說你是好人，你不會殺人，就可以不去立殺人者要判死刑吧？還是要立法。」受訪者4A也表示：「那不是說法律一立出來就一定要用啊！你現在立了，可能我們未雨綢繆。」言下之意，愛滋病患可能犯行，立了法便有備無患。

有關愛滋病患是否應獲得免費治療，在民國七十九年愛滋防治條例公佈實施前，作為公眾論壇的媒體有相當多的討論，但其論述多加重愛滋病死亡是咎由自取而不應得到免費治療的意象（陳婷玉、徐美苓，2001）。雖然最後主管單位通過了愛滋病的免費治療，但在之後幾年，媒體的論述似乎未見轉變。本研究中的受訪者在論及愛滋病患是否應獲得免費醫療時，亦是圍繞在愛滋/愛滋死亡的有罪/無罪分別上，若是「自找」的，則不應將納稅人的錢用在愛滋病患，否則便是縱容犯罪。容或有少數贊成愛滋免費治療者，但所持理由多半是害怕愛滋病患者「報復」的「偏差行為」所採行的讓步行動，而非顧及其公平就醫的政治權利。受訪者1D說：「我是想說，如果是要防疫啊，不管什麼原因他得到愛滋病，然後這個病又是一個對大家很危險的，因為他可能會有報復的心理，如果這個社會對他這麼少的關懷，然後又只給他這麼少的資源，對他來說可能...帶著報復的心理到處去跟別人做性交或怎樣，其實這個反而沒辦法控制。」

受訪者對愛滋病是罪惡的詮釋，除了表現在對愛滋病患行為的疑慮（如捐血）、對規範愛滋病患行為法令的支持、對愛滋病患獲得免費治療的反彈之外，似乎還投射在對愛滋遺體解剖的討論之中。過去愛滋防治條例中規定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屍體，必要時，經病患或死者家屬之同意，得施行病理檢驗。本研究受訪者除了由防疫及研究的角度出發，站在優勢的解讀位置，更有受訪者指出：「我覺得這樣死很值得啊！（指第一位女愛滋病人過世，高醫漏夜做屍體的病理解剖。）因為她自己知道它是這個（愛滋病）死的啊！我覺得這樣死了還可以有...可以解剖幫助大家不錯啊！」

(受訪者 1G)。然而同一位受訪者與其他多位受訪者對自身死後解剖的態度十分保留，強調自己的長輩或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接受解剖，認為那是不尊重死者、是丟臉的事。因此受訪者強調愛滋病遺體解剖的貢獻性其實是一種「贖罪」的表徵，因為愛滋患者在生前犯了罪，因而在生命的最後，藉著貢獻自己的身體以供後世研究，如此來減輕其罪責。

四、愛滋病等於死亡

早期有關愛滋病意象的研究發現，美國兒童和青少年思及愛滋病時，第一個想法便是死亡，愛滋病與死亡的聯結是如此緊密，遠遠超過其他建構，死亡是早期愛滋病意義建構中最重要構面 (Whalen et al., 1995)。Housel (1995) 曾主張人類最強的動機行為不是如佛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論所說的「性」，而是對「死亡的恐懼」，而愛滋病患/感染者的存在便代表著一種死亡的提醒，或者說，所有疾病的意義會全部轉移到染病的人身上，那麼愛滋病人本身就代表「死亡」。

古今中外，死亡一直是一個晦暗、恐怖、未知、神秘的社會建構，對死亡的恐懼更使我們將之視為一個禁忌的話題，是不能被看到、聽到及被提醒的。死亡被一般人認定是不好的、沒有意義的、痛苦的、悲慘的、邪惡的，那麼瀕死的人透過感染，亦被我們認為受到污染——受到死亡的污染 (Weisman, 1984)，於是對他們疏離、孤立、歧視。Lester (1992) 的研究發現，一般人對因癌症而瀕死的人之偏見，甚至比對傳統上具偏見的種族、宗教團體 (如黑人、猶太人、墨西哥裔美人) 更甚，對這些瀕死及受苦的人感到更疏離，更不願意接納。

誠然在雞尾酒療法問世，病患病情獲得明顯控制之後，多達 95% 的患者情況獲得改善，可將帶原者控制在長期不發病，而已經發病者經一段時間治療也可以回到帶原狀態而不發病 (胡恩蕙, 2004)，而目前國內接受雞尾酒療法的愛滋病患，平均餘命為 21.5 年 (蕭白雪, 2007)，公共衛生與醫學界也許早已把愛滋病視為慢性病，然而台灣媒體愛滋病再現的「慢性病化」似乎是最近之事，而且報導相當零星。

由於本研究進行的時間在 2003 年中，其時台灣的愛滋感染人數正攀升至高峰，雖然愛滋病的病情已可獲得有效控制，但媒體的愛滋病「慢性病化」並未開始，本研究訪談過程中愛滋病明顯地被視為「絕症」，多位與談者提及愛滋死亡的必然性；得愛滋病，死亡是遲早的事，如此一來，不僅帶給人們沮喪和絕望感，更可能造成優勢解讀者主張，既然是無藥可救的不治之症，也就不必花錢來醫治病患，同時也讓受訪者對「故意」感染愛滋病給他人者，更加深惡痛絕，認為其罪行和預謀殺人並無二致，因此必須對其偏差行為採取重罰以起阻嚇之功效。受訪者 4F 就表示：「...尤其是在拿藥 (雞尾酒療法) 的部份，我告訴你，愛滋病雖然可以治療，可是那雞尾酒是一直打 (應是指吃藥)、一直打，那根本就是遲早會死的人，你還一直打，錢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所以是可以補助，但是要補助在預防上...

而不是投資在無意義的治療。」。受訪者 2A 也認為：「最主要愛滋病一定會死亡，只是說早晚而已，可是其他並不一定死亡，重點是它一定會死亡。所以一定會設這個法規（愛滋病患捐血依法處罰）。」。

五、愛滋病 vs. SARS

Fairclough (1995) 在批判語言學的社會文化實踐層次分析中，提及互文分析 (intertextual analysis)。這類分析從論述實踐的觀點來看文本，關注的是文本中論述實踐的痕跡，互文分析的目的在於找出文本中構連在一起的各種文類與論述，互文分析將特定文本放置在由論述網絡形成的文化切面中檢視，因此必須依賴對社會文化脈絡的瞭解。本研究的焦點訪談進行期間正值非典型肺炎 (SARS) 疫情在台灣蔓延的後期，因此在閱聽人討論所形成的論域中，發現 SARS 常被受訪者用來與愛滋病比對。由於 SARS 是這群大學生所經歷過疫情最嚴重，也最近身，同時也是最晚近的大型流行病，帶給全台灣人民極大的震撼與傷痕，因此最容易由閱聽人的認知庫存中提取出來。而 SARS 流行期間，相關單位對感染者所採取的隔離、防範措施，一般人對病患的歧視與排斥，似乎也被受訪者用來與過去愛滋病患所受到的對待互相比較、互相呼應而賦予正當性、合法性。這種將 SARS 與愛滋病構連起來的互文性，似乎更確證了媒體文本對愛滋死亡的負面建構，也將這群閱聽人進一步推向文本的優勢解讀。受訪者 1D 便說：「就像第一個 SARS 也是這樣子（死者遺體與其衣物一起焚化），...都燒掉的，就是什麼衣物都丟進去啊，我覺得這個在那個年代，看起來好像是第一個 SARS，然後被燒掉那種感覺，我會覺得還是都燒乾淨好了。」。受訪者 4B 說：「我覺得這跟得 SARS 的感覺很像，好像你得這個病死掉後，你之前所有的價值都被毀滅，讓人覺得你這個人活在這世界上，就是來得病害人的。」。受訪者 1B 則指出兩者不同之處：「這兩個（愛滋病和 SARS）後果是不一樣的。因為你一旦傳染給別人...就是愛滋病一定會傳染給別人，然後你傳染給別人他...那個人就是會死掉...就像是我們講的...就是愛滋病一定會死掉，可是 SARS 不一定，所以我覺得愛滋病的處罰要更重，可能判個死刑或是...」。SARS 不停地躍入本研究閱聽人論述中，與愛滋病相互觀照；兩者所帶來的恐懼、破壞與社會、文化意涵。

六、新聞教育與愛滋解讀

本研究除了歸納出若干閱聽人愛滋死亡解讀的主題，並探究閱聽人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如何與其解讀互動。本研究中閱聽人皆為新聞/傳播科系主修學生，而有關媒體理論與新聞產製的邏輯似乎亦影響這群大學生的解讀。

偵察環境、告知危險與機會，這是任何一個傳播/新聞主修的大學生都耳熟能詳的大眾媒介功能。本研究發現，一旦閱聽人將媒體的作為解讀為善盡告知大眾的責任、義務，便容易原諒其可能損及病患權益以及加重偏

見、歧視的疾病/死亡建構，而對其做出優勢解讀。受訪者 3B 說：「以新聞的角度，他是告知，告知的義務跟責任，發佈這篇新聞。」愛滋病患對善良的第三人（未罹病者）而言，是危險、威脅，必須盡快並詳盡、完整地公諸於世，將他的背景資料，尤其是性行為的歷史軌跡細細道來，一方面警惕曾與愛滋病患「接觸」過的人，也阻嚇潛在的犯行者，而這種媒體功能的認知，亦阻止受訪者對抗文本的優勢意義。

而過去許多研究指出，新聞的消息來源多依賴權威（科學、醫學、政治、法律專家），使得優勢團體的觀點和利益被建立及維持，而弱勢團體則被消音、邊緣化、甚至污名化。媒體對權威倚賴的結果亦反映在這群閱聽人的解讀，造成一種權威迷思。本研究發現閱聽人對媒體中權威的言論相當倚賴而無法提出質疑，甚至並未察覺，尤有甚者，閱聽人對消息來源的引用，解釋為媒體的中立立場而為媒體辯護：「我覺得媒體在呈現的過程，其實沒有什麼不當，因為我覺得他在講的過程都是說，嗯，基金會指出或是台大的社工人員指出，或只是醫生講什麼...就是他會陳述一些別人講的話，但他（指媒體）也不會加入自己評斷什麼的，...很多他都只是藉由一些消息來源來寫一篇報導而已。」（受訪者 2H）。而一旦涉及醫院的措施、醫師的看法、專家的意見，乃至政府的政策、法律的條文、機構的規定等，閱聽人便傾向做出優勢解讀，無力提出質疑。

另外，受訪者雖然對新聞產製的邏輯多有批評，認為媒體對愛滋病的報導經過刻意的選擇、渲染，以聳動恐怖的標題吸引讀者的目光，為的只是商業利益，然而閱聽人的批評似乎僅止於此。對於新聞產製、運作方式的熟悉，讓這群大學生將媒體對愛滋/愛滋死亡的再現，歸因於媒體「新聞價值」的取捨，而變得可以理解或可以諒解，這種新聞產製或新聞價值迷思，也似乎成為媒體面對譴責的擋箭牌。而受訪者雖指控媒體聳動、煽色腥、過度渲染、框架議題，卻似乎無法不受到媒介文本的召喚，也無法識穿文本所隱含的意識型態。

伍、結論與討論

Hall 的製碼/解碼模式，指出訊息的產製與接收都是整個傳播過程中的一個「瞬間」，媒介機構必須以一種有意義的論域形式產生訊息（製碼），訊息也必須有意義地被解碼，也就是這個被解碼的意義才能影響、指導、勸服、娛樂閱聽人，繼而產生知覺、認知、情緒、意識形態，乃至行為結果。但 Hall（1980）卻並不認為產製與接收是對等的，他主張產製端較為優越，兩者在關係與位置上的結構不同而使兩造並不平等。

再由文本本身的「結構多義性」來看，即使一個文本蘊含許多可能的意義，媒體產製者仍可能呈現其優勢或偏好的意義（Curran, 1995; Neuendorf, 2001）。閱聽人雖然有相對自主權，但文本的「先決性」已使閱聽人受制於文本的結構，所以閱聽人的詮釋仍是受限的，即使偶而出現 Eco 所謂脫軌（aberrant）的解讀，

但人們無法自由地創造意義 (Livingstone, 1998)。Deacon et al. (1999) 研究一則報紙新聞的產製乃至接收，即由製碼到解碼的「自然歷史」，同時對不同社群的解讀進行分析，發現產製一方所企圖的意義和讀者理解與詮釋的新聞意義之間確有一致性，因此發出警語，認為高估閱聽人詮釋的自由相當危險。

本研究欲窺知新聞/傳播相關主修的大學生對報紙愛滋死亡新聞之解讀，是否因為對新聞產製過程及媒體運作邏輯的瞭解，而能對新聞中所隱含的意識型態提高警覺，進而產生抵抗/對立的閱聽人論述。研究發現，這群新聞/傳播主修的大學生，在個人情感上傾向同情愛滋病患者，而在討論愛滋病患者受到歧視或不公平待遇的報導時，流露出其人道精神，然而一旦新聞內容涉及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大眾健康時，閱聽人便無法質疑文本的論述建構及其意識型態，因此對早期愛滋病患的隱私洩漏、遺體解剖的描繪、火葬、愛滋病患捐血以及將愛滋傳染給他人的罰則等，幾乎清一色地傾向文本的優勢解讀。

盧嵐蘭 (2007) 曾強調閱聽人面對媒介時伴隨而生的自我形構過程，舉凡閱聽人對媒介的使用、挪用、解讀、詮釋等莫不緊繫於自我。以詮釋主義的立場而言，閱聽人是在與媒介的互動中，透過賦予意義的過程而彰顯自我的形象。盧嵐蘭更 (2005) 進一步指出，每個人或團體的自我認識，必須立基於設定某種異己來作為參照，而建構認同的過程中，「他者」經常被扭曲與邊緣化，以便去服務自我認同的優越性及正當性。許多研究早已指出媒體的他者建構 (倪炎元, 2003; 徐美苓、吳翠松、林文琪, 2003)，本研究則發現閱聽人「利他」的自我形塑貫穿了整個閱聽人愛滋文本的詮釋過程，並且表現在對文本的優勢解讀上。林芳玫 (1996) 曾批評，閱聽人研究學者常明示或暗示，抗拒與協商解讀是複雜、有趣、值得研究的動態過程，而順著文本製碼方式的優勢解讀則是乏善可陳。本研究描繪閱聽人的文本優勢解讀如何協助其自我形象的建立與維持，進行一種利他的意義建構及認同實踐；不論在法律或道德層面，保護無辜第三者及公平正義，一直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價值，然而也就是這樣的自我建構與認同過程，使愛滋病患被閱聽人建構成邪惡的他者而加以污名化與歧視。

Chyng 與 Sharrer (2004) 亦指出，深植於一個社群生活的基本價值，是一個社群長久以來賴以生存的信念，一個文化價值賴以維繫的動力，這種信念似乎並非幾堂媒體識讀課程可以顛覆。就這個角度來看，本研究中的閱聽人在解讀愛滋死亡新聞時所表現出來的「利他主義」、「利社會主義」也可以視為我們文化中一個重要的價值，長久以來構成社群的堅定信念以及個人的美德認同，要求一個人違背其文化建構中以為「真」的信念，絕非易事。媒體識讀教育也許能幫助我們看清某些媒體的「邪惡」企圖，但要我們放棄某些根深蒂固的價值觀，似乎難以奏效。

此外，新聞科系大學生不僅無法意識到文本受到文化框架的影響，反而因囿限於所受新聞教育而更加無法批判媒體。一旦文本被閱聽人解讀為媒體善盡「告知」的責任，以期能對大眾起警惕、嚇阻的作用時，閱聽人便容易和媒體站在同一陣線，做出優勢解讀。

雖然多數受訪者都或多或少地批判了媒體的作為，認為媒體偏頗、刻意強調

愛滋病與同性戀、性行為、死亡的關連性，並建構了讀者的主觀真實，有些閱聽人亦提出了媒體的商業性質，並批判其煽色腥的新聞價值，也否定了新聞所謂客觀中立的可能性。然而這些盧嵐蘭（2007）稱之為素樸的媒介批判卻未能使得閱聽人對其產製的文本產生太多懷疑或反抗，反而將媒體再現愛滋死亡的論述實踐僅歸咎於「新聞價值」與「商業考量」的取捨，而未能識清其中的意識型態宰制與權力運作。如此看來，新聞科系大學生所受的媒體專業知能訓練，卻反而可能成為這些「專業」閱聽人陷入媒體宰制意識型態的幫凶，這恐怕是傳播/新聞教育機構始料未及之事。

訪談中亦發現閱聽人因對愛滋病知識的無知或錯誤認知而接受文本的意涵。如此看來，閱聽人似乎還需要其他專業素養，如包含愛滋專業知識的科學與醫學素養、健康與公共衛生素養、人權素養，乃至攸關一般人自由安全及愛滋病患權益保障的法律素養等。也許正如 Kellner 與 Share（2005）所言，在這個科技革命的年代，公民需要發展多元素養；媒體素養、電腦素養、民主素養、健康素養，也許還要加上對各種議題知識背景理解的「議題素養」等，方能使個人在心智上穿透媒體所建構的迷障，不被媒體左右，進而能與媒體對話及監督媒體。

此外，本研究乃延續過去研究者對愛滋病死亡之媒體再現研究而進行的閱聽人分析，文本分析自 1984 年底國內發現的第一個愛滋病例報導至 2000 年為止，而閱聽人焦點團體訪談則在 2003 年中進行。時至今日，固然愛滋病患的就醫、就學、就業、居住等基本人權議題時而浮上媒體版面（如：許麗珍，2004 年 11 月 19 日；孟祥傑、林怡婷，2004 年 12 月 9 日；蕭白雪，2007 年 8 月 8 日），但其他論述卻仍可能加重愛滋烙印與恐懼，如台灣愛滋病的疫情惡化（如：楊惠中，2005 年 12 月 1 日）、毒癮與愛滋的構連（如：張錦弘，2006 年 6 月 4 日）、男同志的性愛轟趴（如：沈俊翔，2004 年 10 月 23 日）、民眾對愛滋病患的排擠，以至患者無處可去（如：楊清雄，2006 年 10 月 12 日；陳惠惠，2006 年 9 月 11 日；郭漢辰，2005 年 6 月 1 日）等。在 2005 年至 2007 年間，愛滋病患收容機構台灣關懷之家協會與所在地社區的訴訟官司當中，我們仍可見到因大眾恐慌所導致的歧視；一審判決關懷之家必須遷出該社區的原因，便是因其已引起社區住戶恐慌，而社區以「免於恐懼」之訴求，打贏這場官司（楊清雄，2006）。直到 2007 年行政院衛生署大幅度修改法律，增訂「保障愛滋感染者的安養、居住權」，才使該案在二審逆轉，關懷之家不必搬遷，然而該收容中心最終仍無法在該社區繼續運作而遷離了原址。這些報導與事件都令人質疑台灣社會對這個疾病及罹病者的包容與接納程度。

目前科學家雖已能對愛滋病進行有效的控制，如美籍華裔科學家何大一博士所提出的高效能病毒治療（HAART，俗稱雞尾酒療法，亦稱三合一療法），然而種種方法仍然無法治癒愛滋病，且藥效因人而異。因此愛滋病固然已經可能如其他慢性病一樣獲得有效控制，一般人仍多視愛滋病為絕症而排斥、歧視愛滋病患（蕭白雪，2007）。本研究固然理解愛滋病預防與治療的醫學與科學研究，在近幾年有所進展，而這些進展亦可能影響到媒體論述如何建構愛滋病與死亡關係，進而影響閱聽眾的感知，因此未來仍應持續追蹤閱聽人的解讀是否亦隨之變化。

此外，在壹週刊、蘋果日報（2003 年創刊）進軍台灣後，由於其內容特色為著重八卦新聞、社會新聞，尤其以腥羶新聞為噱頭，似乎更助長我們社會偷窺的習癖，而對若干群體造成傷害。壹傳媒對台灣新聞與新聞教育亦產生重大衝擊，「蘋果化」更成為媒體品質向下沈淪的同義字，因此壹傳媒對愛滋病議題的處理以及對閱聽人詮釋的影響，在未來應是值得關切的論題。

本研究的資料取得時間雖距今有些時日，但回顧晚近有關愛滋病的新聞，雖有愛滋病患權益的報導，但烙印化的文本及民眾的恐懼反應仍不少見，加以愛滋病至今仍被視為「絕症」，並無疫苗或特效藥，因而其與死亡之間的構連仍舊相當緊密，因而本研究的發現，應仍具相當程度的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 尤昱婷（2001）。新聞報導中的愛滋人權分析—權利與權力。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台北市。
- 民生報（1988 年 8 月 5 日，第 23 版）。女愛滋病人昨不治 高醫漏夜作病理解剖。
- 行政院衛生署（2009）。《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網際網路）。網址：<http://www.cdc.gov.tw/public/data/7122614511871.doc>。
- 李佩英（2006）。韓劇《大長今》之接收分析研究：男女閱聽人對長今角色的解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台北市。
- 吳志怡（2002）。女性政治人物媒體形象之建構以總統府緋聞案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南華大學傳播管理學系，嘉義。
- 沈俊翔（2004 年 10 月 23 日）。同志運動 被同志毀了！。聯合報，A15 版。
- 李文忠（1993）。大學生對愛滋病的認知、態度、行為改變、訊息訴求之綜合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台北市。
- 林文琪（1996）。新聞論述建構之愛滋病語藝視野—以中國時報聯合報為分析現象。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新北市。
- 林好芳（2005）。國小中年級兒童對卡通內容及暴力行為的解讀方式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行政研究所，屏東。
- 林芳玫（1996）。《阿信》連續劇觀眾研究：由觀眾詮釋模式看女性與社會規範的互動關係。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153-193。
- 孟祥傑、林怡婷（2004 年 12 月 9 日）。愛滋學生 97 院校拒收。聯合報，C08 版。
- 胡恩蕙（2004 年 10 月 29 日）。愛滋 隨性的代價。民生報，A14 版。
- 胡幼慧（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 郭漢辰（2005 年 6 月 1 日）。屏東監獄專責收容愛滋患 居民恐慌 今發動戰爭。民生報，A12 版。
- 倪炎元（2003）。再現的政治：台灣報紙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台北：韋伯文化。
- 徐美苓（2001）。愛滋病與媒體。台北：巨流。
- 徐美苓、陳瑞芸、張皓傑、賴奕帆、林佳韻（2006）。愛滋新聞閱讀與對感染者與病患的態度以針對年輕族群的訊息設計實驗為例。新聞學研究，87，1-49。

- 徐美苓、吳翠松、林文琪 (2003)。愛滋陰影下的情慾規範：新聞論述中的他／她者建構。《台灣社會研究》，50，81-143。
- 徐孟延、邱琬淇 (2006)。紀實娛樂頻道魅力何在？探悉閱聽人的收視過程：選擇、接收與詮釋。蘇蘅 (主持)，數位化時代的媒體生態、教育與倫理。2006 年中華傳播學會研討會，香港。
- 黃如伶 (1995)。閱聽人愛滋病知識、先前態度、傳播行為與愛滋病防治政策之關連性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台北市。
- 陳婷玉 (2009)。不得好死？---愛滋病死亡的媒體建構。《長榮大學學報》，13 (1)，69-93。
- 陳婷玉、徐美苓 (2001)。愛滋病的死亡建構。黃鈴媚 (主持)，華人社會的傳播研究。2001 年中華傳播學會學術研討會，香港。
- 陳惠惠 (2006 年 9 月 11 日)。毒癮愛滋患者 面臨無人收容。《聯合報》，E4 版。
- 許麗珍 (2004 年 11 月 19 日)。中油台電招考 不給愛滋機會。《聯合報》，A06 版。
- 張錦弘 (2006 年 6 月 4 日)。吸毒共用針頭 愛滋散播主因。《聯合報》，A06 版。
- 張錦華 (1994)。媒介文化、意識型態與女性---理論與實例。台北：正中。
- 楊清雄 (2006 年 10 月 12 日)。一審敗訴 關愛之家無處可去。《民生報》。
- 楊惠中 (2005 年 12 月 1 日)。台灣愛滋病疫情惡化。《聯合報》，UN20 版。
- 廖依婷 (2004)。「慾望城市」之女性觀眾接收分析---從觀眾與角色之互動看其解讀形態。張錦華 (主持)，性別與閱聽研究。世新大學性別、媒體與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台北。
- 盧嵐蘭 (2005)。媒介消費：閱聽人與社會。台北：揚智。
- 盧嵐蘭 (2007)。閱聽人與日常生活。台北：五南。
- 盧嵐蘭 (2008)。閱聽人論述。台北：秀威。
- 謝炫達 (2001)。全球化廣告接收分析---影響閱聽人解讀形態之因素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研究所，台北市。
- 聯合報 (1987 年 7 月 25 日，第 3 版)。愛滋病防治條例大幅修改 原擬訂從重量罰改採從寬。
- 蕭白雪 (2007 年 8 月 8 日)。法官強調 共處不會感染。《聯合報》，A10 版。
- 蘇峰山 (2005)。批判的論述分析導論。在林本炫、周平編，質性研究方法與議題創新。嘉義：南華大學教社所。
- Abercrombie, N., & Longhurst, B. (1998). *Audiences: A sociology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Alasuutari, P. (1999). The shape of audience research. In P. Alasuutari (Ed.),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Albert, E. (1986). Illness and deviance: the response of the press to AIDS. In D. A. Feldman & T. M. Johnson (Eds.),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AIDS: Methods and theory*. New York, NY: Praeger.
- Asera, R., Bagarukayo, H., Shuey, D., & Barton, T. (1997). An epidemic of apprehension: Questions about HIV/AIDS to an East African newspaper health advice column. *AIDS Care*, 9(1), 5-12.

- Barker, M. (2006). I have seen the future and it is not here yet..., or, on being ambitious for audience research.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9, 123-141.
- Bertman, S. L. (1991). *Facing death: Images, insights, and interventions*. Hemisphere Publishing Co.
- Boshier, R. (1992). Popular discourse concerning AIDS: its implications for adult education. *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 42(3), 125-135.
- Bradbury, M. (1999). *Representations of death: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hyng F. S. K., & Sharrer, E. (2004). Staying true to Disney: College students' resistance to criticism of the little mermaid. *Communication Review*, 7(1), 35-55.
- Clarke, J. N., Friedman, D. B., & Hoffman-Goetz, L. (2005). Canadian Aboriginal people's experiences with HIV/AIDS as portrayed in selected English language Aboriginal media (1996-2000).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0(10), 2169-2180.
- Clarke, J. N., McLellan, L., & Hoffman-Goetz, L. (2006). The portrayal of HIV/AIDS in two popular African American magazine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11, 495-507.
- Cobley, P. (1994). Throwing out the baby: Populism and active audience theor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6, 677-687.
- Crossley, M. L. (1997). "Survivors" and "victims": Long-term HIV positive individuals and ethos of self-empowerment.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45(12), 1863-1873.
- Crystal, S., & Jackson, M. (1992). Health car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IDS: The impact of disease definitions. In J. Huber, & B. E. Schneider (Eds.), *The social context of AIDS*. Newbury Park, CA: Sage.
- Curran, J. (1995). The new revisionism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reappraisal. In O. Boyd-Barrett, & C. Newbold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A reader*. New York, NY: Arnold.
- Curren, J., & Gurevitch, M. (1997). 大眾媒介與社會(Mass media and society) (徐詠絮、唐維敏譯)。台北：五南。(原作1991年出版)
- Deacon, D., Fenton, N., & Bryman, A. (1999). From inception to reception: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 news item.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1(1), 5-31.
- Denzin, N. K. (1998). Viewing, reading, listening : Audiences and cultural reception. *Social Forces*, 76(3), 1164-1166.
- Devine, P. G., Plant, E. A., & Harrison, K. (1999). The problem of "us" versus "them" and AIDS stigm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s*, 42(7), 1212-1228.
- Doka, K. J. (1997). *AIDS, fear, and society*. Bristol, PA: Taylor & Francis.
- Eves, R. (2003). AIDS and apocalypticism: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pidemic from Papua New Guinea.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5(3), 249-264.
- Fairclough, N. (1995).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 Goodwin, R., Kozlova, A., Kwiatkowska, A., Anh, N. L. L., Nizharadze, G., Kylvet, A., & Rämmer, A. (2003). Social representations of HIV/AIDS in Central

- European and Eastern Europea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6(7), 1373-1384.
- Gunter, B. (2000). *Media research methods: Measuring audiences, reactions and impact*.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ray, A. (1999). Audience and reception research in retrospect: the trouble with audiences. In P. Alasuutari (Ed.),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all, S.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pp. 128-138). London, Hutchinson.
- Hall, S. (1982).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M. Gurevitch, T. Bennett, J. Curran, & J. Woollacott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New York: Methuen.
- Hays, J. N. (1998). *The burdens of disease: Epidemic and human response in western history*. Piscapaway,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Housel, D. A. (1995). Spirituality and death and dying from a gay perspective. In J. K. Parry, & A. S. Ryan (Eds.), *A cross-cultural look at death, dying, and religion*. Chicago, IN: Nelson-Hall Inc.
- Kavoori, A. P. (1999). Discursive texts, reflexive audience: Global trends in television news texts and audience receptio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3(3), 386-398.
- Kellner, D., & Share, J. (2005). Toward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Core concepts, debates, organizations, and policy.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6(3), 369-386.
- King, D. (1990). "Prostitutes as pariah in the age of AIDS": A content analysis of coverage of women prostitutes i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985-April 1988. *Women & Health*, 16, 155-176.
- Kitzinger, J. (1998). Media impact on public beliefs about AIDS. In D. Miller, J. Kitzinger, K. Williams, & P. Beharrell (Eds.), *The circuit of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strategies, representation and audience reception in the AIDS crisis*. Newbury Park, CA: Sage.
- Kline, K. N. (2006). A decade of research on health content in the media: the focus on health challenges and sociocultural context and attendant informational and ideological problem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11, 43-59.
- Lester, D. (1992). The stigma against dying and suicidal patients: A replication of Richard Kalish's study twenty-five years later. *Omega*, 26(1), 71-75.
- Livingstone, S. (1994). Watching talk: gender and engagement in the viewing of audience discussion program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6(3), 429-447.
- Livingstone, S. M. (1998). *Making sense of television : The psychology of audience interpreta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Livingstone, S. (2006). Does Advertising Literacy Mediate the Effects of Advertising on Childre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wo Linked Research Literatures in

- Relation to Obesity and Food Choi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6(3), 560-584.
- Lunt, P., & Livingstone, S. (1996). Rethinking the focus group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6(2), 79-100.
- Lupton, D. (1994). *Moral threats and dangerous desires: AIDS in the news media*. Bristol, PA: Taylor & Francis.
- Miller, D., & Beharrell, P. (1998). AIDS and television news. In D. Miller, J. Kitzinger, K. Williams, & P. Beharrell (Eds.), *The circuit of mass communication: Media strategies, representation and audience reception in the AIDS crisis*. Newbury Park, CA: Sage.
- Moores, S. (1993). *Interpreting audiences* (chapter 2).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oran, K. C. (2003). A reception analysis: Latina teenagers talk about telenovelas (Electronic version). *Global Media Journal*, 2(2).
- Morley, D. (1992). *Television audience and culture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Morley, D. (1995). 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 (Television, Audiences & Culture Studies) (馮建三譯)。台北：遠流。(原作1992年出版)
- Morley, D. (1999). 'To boldly go...'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reception studies. In P. Alasuutari (Ed.),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orley, D., & Brunson, C. (1999). *The nationwide televis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Neuendorf (2001). Viewing alone? Recent considerations of media audience studi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5(2), 345-354.
- Nightingale, V. (1996). *Studying audience: The shock of the real*. London: Routledge.
- Pollock III, P. H., Lilie, S. A., & Vites, M. E. (1993). On the nature and dynamic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case of AID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4(1), 123-135.
- Posel, D., Kahn, K., & Walker, L. (2007). Living with death in a time of AIDS: A rural South African case stud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35, 138-146.
- Ruddock, A. (2001). *Understanding audienc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chroder, K. C. (1994). Audience Semiotic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and the ethnographic turn in media research,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6(2), 337-347.
- Small, N. (1993). Dying in a public place: AIDS deaths. In D. Clark (Ed.), *The sociology of death: Theory, culture, practic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Smith, D. J. (2004). Youth, sin and sex in Nigeria: Christianity and HIV/AIDS-related beliefs and behavior among rural-urban migrants.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6(5), 425-437.
- Sontag, S. (1990).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Y: Anchor Books.
- Volinn, I. J. (1989). Issues of defini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AIDS and lepros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9(10), 1157-1162.
- Watkins, B. (1998). Women, AIDS, and theatre: Representations and resistances. *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 19(2/3), 167-180.

- Weisman, A. (1984). Appropriate and appropriated death. In E. S. Shneidman (Ed.), *Death: Current perspectives*.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Pub.
- Whalen, C. K., Henker, B., Burgess, S., & O'Neil, R. C. (1995). Young people talk about AIDS: "when you get sick, you stay sick".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24(3), 338-345.
- Wood, H. (2006). The mediated conversational floor: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audience reception analysi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9(1), 75-103.
- Woolford, A. (2001). Tainted space: Representations of injection drug-use and HIV/AIDS in Vancouver's downtown eastside. *BC Studies*, 129, 27-50.
- Ziehl, S. C. (2002). Baby headed households: Media (mis)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AIDS debate'. *Society in Transition*, 33(3), 432-445.

附錄一

1. 愛滋中途之家 陪伴愛滋患最後一程 (民生報, 88.7.1)
2. 安寧寺廟 泰國愛滋病患棲身所在
死亡／在這裡 是再平常不過的事
活著／信任寺方 給他們帶來希望 (中國時報, 85.11.12)
3. 愛滋病帶原者 兩秒鐘多一個 (民生報, 81.5.16)
4. 他死了！那個愛滋病人
凌晨一時，楊性同性戀者死於高醫附設醫院，遺體將在病理解剖後銷毀。衛生署正在查他隨身攜帶的一本詳細記載性伴侶的黑色小冊子 (聯合晚報, 77.5.9)
5. 愛滋帶原者捐血，依法重罰
將公告 讓高危險群知難而退 (民生報, 81.11.30)
6. 女愛滋病人昨不治 高醫漏夜作病理解剖 (民生報, 77.8.5)
7. 泰撈女染愛滋 曾接客 5 百人
防疫震撼彈！衛署發出‘召集令’有請 6 至 9 月曾在台北買春男性快去檢驗是否
遭感染 (聯合晚報, 85.11.8)
8. 愛滋免費治療 衛署擬翻案
反對如此花‘納稅人的錢’正說服立委二讀時改免費‘檢查’(聯合晚報, 79.11.9)
9. HIV 烙印下的孤獨告白 (中國時報, 83.5.23)
10. 讓懷念與祝福 逐水燈漂向故人
紅絲帶在他們臂膀 愛與淚在暖暖心中 (民生報, 84.12.2)